半是儒家半释家:周作人思想研究

序一……舒　芜（1）

序二……温儒敏（6）

序三……姚春树（11）

导言　关于周作人思想家身份及研究的现状……（1）

第一章　基督教“博爱”的思想是好的……（16）

第一节　基督教的“精义”在博爱……（16）

第二节　“暴力绝对不可利用”……（29）

第三节　怨恨与文学的本质冲突……（50）

第二章　现在的非基督教运动是“宗教的非宗教运动”……（68）

第一节　“信教自由”与“东方式的攻击异端”……（68）

第二节　“科学的”非宗教运动与“宗教的”非宗教运动……（74）

第三节　不可有宗教气而变成教徒……（81）

第三章　真正的中国国民思想是道教的，即萨满教的……（98）
第一节　国民的思想里法术的分子要比宗教的多得多……（99）
第二节　“神道设教”与民众的鬼神信仰……（111）
第三节　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是“防乱”……（130）

第四章　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办差……（149）
第一节　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149）
第二节　晚明文学中“包含着一个新文学运动”……（166）

第五章　释之忍与悲足补儒家之不足……（186）
第一节　从种业论到闭户读书论……（187）
第二节　茹苦忍辱，斯乃得度……（202）
第三节　非正统的杂家……（222）

第六章　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者……（240）
第一节　告别臣民社会……（240）
第二节　爱国自“兴民权”起……（247）
第三节　为自己故而爱国，非为国家故而爱国……（256）
第四节　提倡世界主义……（265）
第五节　回到民族主义……（273）

第六节　“个人的自觉”比“忠孝的伦理”更重要……（286）

第七章　了解日本，须自宗教入手……（321）
第一节　儒教绝不是中国文化的基础……（321）
第二节　日本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原来的神道……（336）
第三节　“所期捐细故，盟好复如初”……（357）

第八章　伦理之自然化……（375）
第一节　礼义本于人情……（375）
第二节　“天道自然”与“自然之伦理化”……（381）
第三节　以古希腊为镜……（399）
第四节　中国伦理的根本在于做人……（432）

第九章　道义之事功化……（440）
第一节　是儒家，但不是儒教徒……（440）
第二节　“投身饲饿虎”与“老人的胡闹”……（451）
第三节　“演戏两年，都是丑角”……（480）

第十章　有怀欲倾吐，且拼面壁说……（505）
第一节　关于“辩解”……（505）
第二节　炳烛南窗赶写书，辛苦为法施……（522）

第三节　荒野的尽头……（538）

结　　语　……（561）

主要参考文献……（574）

后　　记……（620）

致读者

有一种猛禽，古时名“枭”，俗称“猫头鹰”。它习性古怪：黑夜活动，白昼栖息；即便睡去，也睁着一只眼睛。这独异的生活方式，使它拥有了与众不同的目光和视野。猫头鹰飞翔时悄无声息，偶尔发出一两声怪叫，难免令人惊悚。

在希腊神话中，它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原型；在黑格尔的词典里，它是哲思的别名；而在鲁迅的生命世界中，它更是人格意志的象征。鲁迅一生都在寻找中国的猫头鹰。他虽不擅丹青，却描画过猫头鹰的图案。我们选取其中的一幅，作为丛书的标志。

我们渴慕智慧，我们祈求新声。这便是“猫头鹰学术文丛”的由来。

编　者

一九九八年九月

序　一

舒芜

哈迎飞女士完成了《半是儒家半释家：周作人思想研究》，将原稿见示。我作为也曾研究过周作人的一个读者，拜读之后，看到国内周作人研究领域的长足进展，反思到我的研究的许多不足，得到许多教益。

首先，周作人研究已经达到什么样情况呢？哈迎飞女士指出，现在国内周作人研究已经学术化而不是用革命义愤和道德谴责来代替科学分析。我看也确实是这样，但要作一点补充：这是指真正谈得上是研究者而言，不包括不能已于义愤谴责者，他们总把研究周作人和为之翻附逆一案混为一谈。

其次，研究周作人有什么意义？我说过：周作人的文化思想是我们不应该拒绝的遗产。哈迎飞女士引过我说的这句话。但是，为什么不应该拒绝呢？我只说：“他的各方面的历史功绩，正因为都具有文化思想上的意义，才高出于当时一般的水平，也才能够成为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这里面就颇有含混。似乎只是因为他的文化思想高出于当时一般水平，没有起到作

用，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继承下来。还有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周作人有没有太超前的思想，当时被认为不合时宜，甚至有害，受到猛烈批判，现在才看出其价值呢？我没有面对这个问题。

哈迎飞女士则明确地说道：“周作人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通向未来的新因素，具有明显的超前性。如周作人对日常生活的重视，对民众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绪的重视，对文学与政治、宗教关系的思考，对希腊文化与日本文化的比较研究，对儒教的批判，对中庸思想的重新解释，对思想启蒙的执著等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因此，盲目地拒绝这一份思想遗产是不明智的。”

整个 20 世纪是充满了战争与暴力革命的世纪，无论历史能不能假设，有没有多种可能，反正事实就是那样。作为“语境”，也就规定了什么合时宜什么不合时宜，什么会被视为有利还是有害。进入 21 世纪，大“语境”变了，标准不同了，“新的价值与意义”自然呈现了，这不一定回头否定过去，但肯定要代替过去。但是世纪性的大代替绝对不是容易的，旧的思维不是轻易会退场的，所以我没有敢深思深究，而哈迎飞女士之敢于说透，就表现出她的非凡理论勇气。

理论勇气来自何处？来自方法。

现在大家常说“同情的理解”，似乎是个感情问题，我以为在理论领域还是个方法问题。并不是从同情出发，为对象说好话，而是如哈迎飞女士所说：“本课题在以往的周作人研究基础上，拟采取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首先是‘回到周作人那里去’，即首先承认‘周作人’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在理解、说明周作人和他自己的思想追求的前提下，严格从这个特殊的个

体出发，为周作人思想研究寻求一个可靠的基础，而不是简单地把周作人独特的思想、追求纳入到某一现成的理论框架。”

过去我们习惯“批判”，凡是研究一个思想，先看同异。与我同者，互相唱和；与我异者，一上来就是“批判”，不待他毕其辞，先找出种种可批之处，迎头痛击一顿完事。哈迎飞女士的方法不同，她所谓“回到周作人那里去”，就是“使毕其辞”，让他把话说完，替他把话说完，而不是把他的独特的思想纳入某一现成的理论框架中去。在叙述策略上，往往似乎只是大段大段周作人本人文句的摘缀连接，而自然得出新颖的结论。

例如，基督教的“博爱”说，在上个世纪的“语境”里，很容易批判，而本书第一章的标题就是《基督教“博爱”的思想是好的》，是在充分推阐了周作人的意见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过去在批判周作人‘非暴力’思想与‘爱之福音’文学观的乌托邦色彩时，对这一思想的合理性显然也认识不足。应该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善待弱者，关爱生命，警惕任何把人当成工具的观念、行为和一切怨恨、报复等非理性情绪，不参加任何羞辱人的事情，不蔑视任何一个普通的人，和所有的人做朋友，尊重并服从法律，即使在遭遇到不公正的情况下，也坚持公正，保持爱心，做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现代公民，无论如何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人类不能以暴力摆脱暴力，以邪恶摆脱邪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周作人的文学观中的一些合理内核。”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深思，不能不承认这个思想的巨大现实意义。

所谓“回到周作人那里去”，也就是“从周作人出发”，或

者说，回到那里是为了从那里出发。周作人自己用“半是儒家半释家”概括他自己的思想，我过去因为对佛家哲学毫无所知，没有能够从周作人的自我概括出发。哈迎飞女士就从这里出发，得出丰硕的研究成果。周作人和鲁迅读过那么多的佛家典籍，二人日记上记载甚明，他们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过去这是个没有开垦的处女地，现在哈迎飞女士下了第一犁，得出结论：“佛教的‘种业论’、‘苦空观’、‘中道观’、禅宗‘不立文字’的语言观以及印度佛教文学的明智通达对周作人的影响是惊人的，尤其是原始佛教反本体的‘苦空观’和中观思想对他的人生观、宗教观及中庸思想的影响，不从佛教这一角度来解读，是很难深入其堂奥的。”使我有耳目一新之乐。我渴望她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成果，渴望还有更多的周作人研究者和鲁迅研究者继续开垦这个处女地。

对于“半是儒家”的问题，我因为根本不喜欢儒学，不喜欢中庸主义，我指出：中庸主义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消极核心，是民族文化肌理里和知识分子精神结构里的恶性肿瘤。周作人的儒学自命与汉以后尤其宋以后的儒教显有不同，其实在中庸主义这个根本点上并无不同，他反封建而不反中庸，这就是他从反封建前列一退再退终于退到与封建妖孽汉奸政客同流合污的悲剧的根源。目前我还没有放弃这个观点。但是哈迎飞女士指出，周作人的中庸思想虽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本质上更近于佛家的中道，即兼顾性空与假有两个方面又指向性空，因此，它与承认等级制度的孔子的中庸之异质。她是运用了“使毕其辞”的方法，尽量推阐周作人的思想而得出这个结论。对比起来，我则多少有些没有让人家把话说完，急于大发

议论的味道。也是没有完全从周作人出发，按照我自己的喜恶把对象加以剪裁。这个问题上，我还要继续反思。

哈迎飞女士的研究非常全面，涉及方面很多，给我教益很多，不能一一列举。我不能满足的地方只有一点：周作人对于女性问题的毕生关注，是他的思想里面一条贯彻始终的主线，这又同他的宗教与非宗教观密切相关，哈迎飞女士却没有在这方面多发挥，这是我唯一感到不足的地方。

哈迎飞女士要我为她的书作序。我只能谈谈我的读后感，很肤浅，但意思是诚实的。

2007 年 3 月 15 日于北京

序　二

温儒敏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许多关于周作人研究的论著陆续问世，但由于还没有充分拉开时代的距离，加上周作人的汉奸身份的确很“碍眼”，这方面的研究始终难于放手。比较而言，新出的哈迎飞的《半是儒家半释家：周作人思想研究》，是思路放得开的一种，也是难得的新秀佳作。作者很清楚，周作人的“附逆”是大节不保，其历史罪责不容推卸，这是讨论的“底线”，但对周作人这样一个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研究又必须超越道德层面的谴责，真正从思想、文化意义的角度做出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读者拿到这本书可能很想知道一个“老问题”：周作人附逆事敌到底动机何在？周作人在抗战爆发后因欲“苦住”北平而终至落水当了汉奸，自然跟他的短视、顽梗、昏昧，以及所谓“小事清楚，大事糊涂”的“迂”有关，这些在以前许多论作中都有分析。但除此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呢？这本书有新的解释。该书认为，周作人的附逆与他的前期人格反差并不如人们想象得那样

大，周氏一生的思想在某些基本方面其实是一以贯之、变化不大的，倒是历史的风云变幻，使他的“不变”带上了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从思想深层看，周氏的附逆跟他的“国家观”有内在联系。周作人站在启蒙主义立场，历来相信国家的本质与功用就是保障人权，专制之下无祖国，反对宗教式的“爱国”。所以他拒绝追随当时国民党的独裁，又对日本军国主义扩张侵略持坚决否定态度，他怀念的是明治时期的日本，认为对外侵略与对内独裁实为一丘之貉。就是说，周作人的附逆落水内在地蕴含着形式的犯罪、不合理（当汉奸）与实质的合理性（反抗宗教性的节烈观）的矛盾。对此结论当然还可以细加讨论，但注意联系周作人思想脉络中那些基本的东西，透过政治和道德的层面，深入到文化心理等角度来剖析他的矛盾行为，进而讨论知识分子道路问题，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周作人在他五十寿辰时写下一首自寿诗，其中有“半是儒家半释家”一句，表明他有现世主义立场，不满现实，又不循迹虚空；另一方面，他又喜释氏之忍与悲，认为释家别有一种历经患难的毅力与睿智，足补儒家之缺。这大概也可以看作是周作人的人生观展示吧。周是“杂家”，读书多而杂，对人类文化各类学说都有批判选择的习惯。这自然是为了建树他自己的精神壁垒，同时也是为了文化批判，特别是为了“国民性研究”。他对儒、释两家都不全赞同，又各有择取。周作人有一著名的说法，认为平常都讲中国有儒释道三教，其实儒教的纲常早已崩坏，佛教也只剩了因果轮回的信仰还流行民间，支配国民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势力了。真正的中国国民思想是道教的。周作人还认为中国人其实是非宗教的国民，信奉的只

是护符法术，而不是神。其实鲁迅也说过类似的话，认为中国人恨和尚，不恨道士，不懂这一点就不能了解中国人。他们都是从宗教观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文化根由，进而观察批判国民性，探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局促在封建专制黑暗里的民族的精神缺陷，包括普遍的非理性宗教的心理情绪，是在做刨根问底的工作。该书特别用“半是儒家半释家”来标示书名，表明其主轴是要讨论周作人跟“儒”、“佛”以及其他宗教文化的关系。这样就抓住了要害，也抓住了周作人整个思想的“纲”。

以前对周作人的研究，也注意到周作人“半是儒家半释家”的思想特点，但对儒、释等各路文化如何在周这里“化合”伸展，较少能做出系统合理的解释，周作人思想给人的印象还是比较杂乱无序的。这本书把重点放在解读周作人的儒释观，进而推展开去，论及周作人与基督教文化、民间宗教文化、日本文化和希腊文化等多方面的关系，考察他如何从蔼里斯、弗洛伊德、拉伯雷、伏尔泰、王充、李贽、俞理初等历史上许多异端思想家那里吸取思想资源，分析他的“非宗教”思想及反省传统文化弊端所依恃的精神底蕴，最终整理出周作人的文化批判与文化“立命”的路数，重新认识周作人对文化转型与文化建设的独特认识与贡献。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

以前看过周作人不少文章，印象是他的涉猎面非常广博，如同接触百科全书，什么宗教、历史、语言、文学、美学、人类学、民俗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美文创作、个性解放、人道精神、妇女解放、儿童发现、国家民族问题等等，几乎无所不包，许多方面往往都有独到的思考与发现。周作人的文章强调理性、常识与人情物理，平淡中见深意，很少

高头讲章；他探讨问题的思维方式是开放的、弹性的，而且常有感受融入，复杂、生涩而富于个性。若论思想发现，近百年来的中国作家除了鲁迅，恐怕极少有人能和周作人比肩。哈迎飞这本著作的可贵之处，在于把周作人作为“独立的思想世界”来考察，而不是先入为主拿某些理论去套，这样就能在坚实的基础上客观评价周作人。读了这本书，我更加深入了解并且信服一个结论：周作人不止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作为独立思想家的地位也是不可忽视的。

该书分十章，分别就周作人思想的十个主要命题展开论评，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不足之处是缺少一个“总论”，虽然结语也有所概括，总嫌视野不够开阔，历史感也最好更充足一些。对于周作人这样的“杂家”，清理出他的思想框架脉络并非易事，但这也是必要的基本的工作。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在讨论周作人的时候，也借用了周氏的眼光，格外注意从宗教心理行为模式角度研究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包括那种掩盖在无神论外衣下的宗教情绪、教士人格、教徒心理，及乌托邦理念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在许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也表现严重。联系当今现实，我们会感到周作人对这些文化弊端的批判性思考，是独特而有深度的，至今仍然有某些针对性。如果说，在 20 世纪由于现代性追求与民族国家的错位，使得五四所倡导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民族精神建设中未能充分施展其活力，那么在重新强调现代化进程的今天，先驱者曾经尝试过的那些思路，应当说是非常值得继承与发挥的思想资源。我们常说当代文化建设要重视传统，从传统中吸取优秀的成分，转为现今的精神动力，然而所谓传统并不限于古代，

近百年来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中产生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资源，部分逐渐积淀下来，也是重要的传统，或者可以称为相对于古代大传统的“小传统”。这种“小传统”的根须可能更加繁密地伸展到当代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中。哈迎飞教授致力于研究周作人这个曾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化思想进程的人物，就是属于“小传统”的整理，是非常切要而又有意义的。

我和哈迎飞教授未曾谋面，以前只零星读过她的一些文章，感觉她治学很踏实而且有深度。在当今浮泛的风气中，像她这样坐得住的年轻学者不多。这次先睹为快，拜读其新作，更感佩她的学力精进，所以我很乐意把这本好书推荐给读者。

2007 年 4 月 25 日于京西蓝旗营

序　三

姚春树

迎飞是一位非常优秀并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青年学者。在治学上，她勤奋刻苦、执着坚毅，善于钻研，非常自信，也很有抱负，她敢于“吃螃蟹”，挑战学术研究中的重大难题。她的这种极其可贵的学术品格，在1996至1999年期间，她师从著名文学史家叶子铭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博士学位、撰写《“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的博士学位论文时，就已表现得相当充分了。难怪叶先生在《“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一书的《序言》中，这样评价他的高足：“迎飞1996年进入南大攻读博士学位，她敦厚朴实，专心致志于群书之中，不露锋芒。然而她悟性很高，勤奋坚韧，聪慧其中。她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与佛教文化的关系的研究，其博士论文……资料丰赡，论证细致，颇多创见。答辩委员会认为，该论文是一篇‘资料翔实，论析精当，富有新意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迎飞的《“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曾荣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如今，我在拜读迎飞这